



大家文存
粵派评论丛书

黄秋耘集

吴琪编

黄秋耘

SPM

广东人民出版社



大家文存
粤派评论丛书

黄秋耘集

吴琪编

本项目受广东省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秋耘集 / 吴琪编.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1

(粤派评论丛书)

ISBN 978-7-218-12125-3

I. ①黄…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9273号

HUANG QIUYUN JI

黄秋耘集

吴琪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古海阳

装帧设计: 张绮华

排版: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技编: 周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3 字数: 350千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粤派评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学术顾问：陈思和 温儒敏

总主编：蒋述卓

执行主编：陈剑晖 郭小东 贺仲明 林 岗 宋剑华

编委：陈剑晖 陈平原 陈桥生 陈小奇 古远清

郭小东 贺仲明 洪子诚 黄树森 黄天骥

黄伟宗 黄修己 黄子平 蒋述卓 林 岗

刘斯奋 饶芃子 宋剑华 谢有顺 徐南铁

许钦松 杨 义 张 柠

总 序

近百年来中国文坛，“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以及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闽派批评”已是大家公认的文学现象，但“粤派评论”却极少被人提起。事实上，不论从地域精神、文化气质，还是文脉的历史传承，抑或批评的影响力来看，“粤派评论”都有着独特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有它的优势和辉煌。只不过，由于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的诸多原因，“粤派评论”一直被低估、忽视乃至遮蔽。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以百年粤派文学以及美术、音乐、戏剧、影视等评论为切入点，出版一套“粤派评论丛书”，挖掘被历史和某种文化偏见所遮蔽的“粤派评论”的价值，彰显粤派文学与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深厚底蕴，不仅能更好地展示广东文艺评论的力量，让“粤派评论”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而且有助于增强广东文化的自信，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促进区域文化的繁荣发展。

出版这套丛书，有厚实、充分的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依据。

第一，传统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化。如汉代以降以陈钦、陈元为代表的“经学”注释，便明显不同于北方“经学”的严密深邃与繁复，呈现出轻灵简易的特点，并因此被称为“简易之学”。六祖惠能则为佛学禅宗注进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内涵。明代大儒陈白沙主张“学贵知疑”，强调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粤派特点的哲学学派。这种不同于北方的文化传统，势必对“粤派评论”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文论传统的依据。“粤派评论”的起源可追溯到晚清，黄遵宪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潮，在

全国产生了普泛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药眠在《创造周报》发表大量文艺大众化、诗歌民族化的文章，风行一时。钟敬文措意于民间文学，被视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创始人。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粤派评论”的代表人物有黄秋耘、萧殷、梁宗岱等人。新时期以来，“粤派评论”也涌现出不少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艺评论家。如饶芃子、黄树森、黄修己、黄伟宗、洪子诚、刘斯奋、杨义、温儒敏、谢望新、李钟声、古远清、蒋述卓、陈平原、程文超、林岗、陈剑晖、郭小东、宋剑华、陈志红等，其阵容和影响力虽不及“京派批评”和“海派批评”，但其深厚力量堪比“闽派批评”，超越国内大多数地域的文艺评论阵营。如果视野和范围再开放拓展，加上饶宗颐、王起、黄天骢等老一辈学者的纯学术研究，则“粤派评论”更是蔚为壮观。

第三，地理环境的优势。从地理上看，广东占有沿海之利，在沟通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广东处于边缘，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近现代以来，粤派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安现状，积极进取，敢为人先，因此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秉承中国学术的传统，又开创了“粤派评论”的先河。这种地缘、文化土壤的内在培植作用，在“粤派评论”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

“粤派评论”有属于自己的鲜明特点。

第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是“粤派评论”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在这方面，“粤派评论”几乎占了文学史写作的半壁江山，而且处于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高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联合发表的著名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中陈平原、黄子平均为粤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方法先进、富于问题意识、善于整合中西传统资源和吸纳同时代前沿研究成果著称，它与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被学界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南北双璧”。杨义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比较方法运用在文学史写作的有效实践，该著材料扎实，眼光独到，分析文本有血有肉，堪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比肩。此外，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古远清的港台文学史写作，也都各具特色，体现出自己的史观、史识



和史德。

第二，“粤派评论”注重文艺、文化评论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粤派评论家追求发现创新，但不拒绝深刻宽厚；追求实证内敛，而不喜凌空高蹈；追求灵动圆融，而厌恶哗众取宠。这就体现了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的结合，经济文化与文艺批评的合流，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文化挖掘的齐头并进，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的相得益彰，多元开放与独立文化人格的互为表里。粤派评论家有自己的批评立场、批评观念，亦有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和生长点。他们既面向时代和生活，感受文艺风潮的脉动，又高度重视审美中的文化积累和文化遗产；既追求批评的理论性、学理性和体系建构，又强调批评的实践性，注重感性与诗性的个性呈现。

我们认为，建构“粤派评论”，不能沿袭传统的流派范畴与标准，它不是一种具有特定文化立场、一致追求趋向和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只是一个松散的、没有理论宣言与主张的群体。因此，没有必要纠结“粤派评论”究竟是一个学派，还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粤派评论”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实体，即虽具有地方身份标识，却不局限于一地之见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群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广东省委宣传部策划、组织、指导编纂出版“粤派评论丛书”，是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文化建设发展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一次文化实践。我们坚信，扎根广东、辐射全国的“粤派评论”必将成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其中一块最稳固的基石。

“粤派评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黄秋耘像

编者简介：

吴琪，女，1985年生，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2011年获西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2014年7月获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2014年7月至今在华南农业大学工作，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批评、美育教学和研究工作。多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小说评论》等核心期刊上，编有《中学美育教材》《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等著作。

战士心 爱国情 文人梦

——黄秋耘充满斗志的文学之路

吴 琪

黄秋耘是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文人，他一生经历坎坷，从戎之路遭遇到的种种磨难、种种经历都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展示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也成为他文学创作最主要的两个主流思想。他既是一位散文家，也是一位批评家，他的作品立足于现实生活，有对生活极敏锐的洞察，他说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勇于干预生活”^①，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因此他以“干预生活”作为其文学创作的中心要点。读黄秋耘的文章，总能感觉到他对生活的满怀深情，对人生的热爱及对现实的关注。他的作品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真实流露，不造作，不虚假，完全是最真实的心灵之感。他对生活的感悟、对文学价值的品评都是极具个人风格的，呈现出独有的感性色彩。

黄秋耘，原名黄超显，笔名秋云、昭彦、跋茵。1918年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顺德县龙江乡，祖居佛山市。黄秋耘出生在一个还算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家境的富裕让他更多地关注到外界的

^① 黄秋耘：《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黄秋耘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动乱与疾苦，对贫苦人民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也是促使其要参加革命的一个直接原因。“我参加革命的目的，概况起来说，一是要抗日救国，争取民族解放；二是要使做工的、种田的老百姓都能不愁温饱，有间像样的房子和几床干净的被窝，并且要做国家的主人。”^①也正是这样的信念，黄秋耘开启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之路，这条路上充满了正义，也充斥着危险，但凭借着一份强烈的爱国力量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一直无所畏惧地前行着，用最本真的文字诠释着他的人生信念。

1935年，17岁的黄秋耘在香港读完了中学，同时考上了香港大学、伦敦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共五所大学。父亲是希望他继承世代相传的祖业，进香港大学或伦敦大学学医。凭当时优异的考试成绩，他已获得了这两间大学的奖学金。由于受舅舅、南社诗人马小进和叔叔黄恕如熏陶，黄秋耘从小对文学就产生浓厚的兴趣，他爱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特别爱读中国古典诗词。黄秋耘的母亲也是有文化的人，读了很多旧诗词，和冼玉清是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冼玉清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教授，在诗词研究上颇有成就。黄秋耘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耳濡目染，日积月累，很自然地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也促使他在中学毕业后毅然放弃了伦敦大学和相关大学的奖学金，回到风雨飘摇的中国内地，进入清华大学国文系读书。但是1936年的北平，已经到了强敌压境、人心惶惶的紧张时刻，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黄秋耘，一入学便投身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参加了民先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从戎之路，直到1949年后才有了专心进行文学创作的机会。

1949年后，黄秋耘曾先后在广州军管会、华南联合大学、华南文艺学院、南方日报社、中共中央联络部、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后任新华社福建分社代社长。1954年秋，调中国作家协会任《文艺学习》常务编委。1956年2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1959年初，转到《文艺报》工作，直至1966年春。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3年隔离审查，1969年9月审查结束，住“五七”干校一年。1970年秋调广东省革委会宣传办公室工作，次年调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后

^① 黄秋耘：《到民间去》，《黄秋耘文集》（第四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调到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任副局长。1976年起，由国家出版局借调，负责主持修订大型古代汉语词典《辞源》工作。1983—1985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借调去编写《一二·九运动史要》。1985年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中国广州国际笔会中心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等。

黄秋耘半生戎马，半生翰墨，从事过军事、翻译工作，做过新闻编辑工作。丰富的经历让他创作了丰富的著作，著有散文集《浮沉》《丁香花下》《黄秋耘散文选》，文学评论集《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文艺思想》《古今集》《苔花集》《琐谈与断想》《黄秋耘文学评论选》《黄秋耘自选集》，杂文、随笔集《锈损了灵魂的悲剧》《按牌理出牌》《杂文选粹》，长篇回忆录《风雨年华》，短篇小说集《渔峡渔民》，儿童文学《高士奇波波的故事》等等。《黄秋耘散文选》曾获广东鲁迅文学奖，根据同名散文改编的电视剧《雾失楼台》曾获金帆奖。《往事并不如烟》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2001年8月16日，84岁的黄秋耘因脑中风病情恶化而病逝于广州，遵照他的遗愿，不发讣告，不举行送别仪式，不惊扰亲朋好友。没有哀乐低回的场面，只有一丛丛鲜花和一曲他生前最喜欢的歌曲《友谊地久天长》，伴着黄秋耘走完了他作为作家和革命者的人生路。

二

1949年10月前黄秋耘一直做党的地下工作，还要以公开职业谋生，没有多少时间写作；1949年10月后直到“文革”前，又几乎都在当编辑，也没有专门从事写作的时间。但是黄秋耘依然没有忘记写作，写作在他看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他情感寄托和情怀抒发的一种方式，他的作品极具思想性，敢于针砭时弊，大胆揭露文学界当时存在的问题，例如《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刺在哪里？》《犬儒的刺》《锈损了灵魂的悲剧》等都代表了黄秋耘的思想，也表达了他一部分的心声。

下乡期间黄秋耘与贫苦农民待在一起，使他深刻感知到他们生活的艰

辛，所以常常在作品里为民发声、为民请命，也是在这样的经历下他写出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不应该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生活中的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些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上是什么艺术家呢？”^①黄秋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把文学与现实联系起来，讲人道主义，主张作品要反映生活、干预生活，为人民群众发声。这种情不自禁的为民请命可以追溯到黄秋耘的中学时代，他平生第一篇作品《吴来源之死》就是在这样契机下完成的。虽然作品由于当时的现实情况没有发表，但是他心系民众、忧国忧民的情怀早已表露于其文字里。

“作为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我们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人民共一个身体，同一个灵魂，和人民结下生死不解之缘，和人民同甘共苦，同歌同哭。”^②黄秋耘用生命在写作，他在思想方面不息的探索精神和始终与最广大劳动者同呼吸共命运的坚定立场，以及自始至终满怀多情和正义的文风，都使得他和他的文字在当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主张评论自由，要真实反映生活，他在《古怪的猫的自白》里提到他的人生信条——要“对革命忠诚，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③。他也是以这个信条作为其进行文学评论的标准。

最能体现黄秋耘思想性的文体当属他的杂文，他在文坛被关注也是因为杂文创作。他的杂文创作时间比较长，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所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广泛，从知识分子的改造、社会现象的批判到为人之道、文学见解等，黄秋耘积极发挥杂文“投枪匕首”的作用，以强烈的批判精神进行文学改造和社会揭露，大胆抒发自己的观点，追求观点的“百花齐放”，反对教条

① 黄秋耘：《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黄秋耘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② 黄秋耘：《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黄秋耘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③ 黄秋耘：《古怪的猫的自白》，《黄秋耘文集》（第三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主义。

他的杂文既有古典文人的气质，也有理想主义的性格禀性。这一方面和他童年时期家庭熏陶有关，另一方面和他对西方文化的钟爱有关，黄秋耘说“除了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散文之外，我更多地用西方文化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对我影响较大的西方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法国的罗曼·罗兰和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和契科夫”^①。黄秋耘受西方文化的人道主义和革命性的思想影响，因此其作品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充满力量的革命精神。应该说，黄秋耘的杂文创作与当时社会状况和政治环境有一定的相关性，杂文的观点和思想随着当时政治变化而变化，注重作品的思想性，深入现实和针砭时弊是黄秋耘早期杂文创作的一大特点。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其杂文创作所关注的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黄秋耘开始以杂文的方式关注文学改造，进行国运与文运的探讨，对文艺现象进行思考，对文学作品的样式发展发表自己的观点，黄秋耘将艺术性融入到杂文创作中，使杂文创作呈现出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特点。而且其杂文创作因为以生命体验为基础，所以作为作家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彰显在其作品中。他强调文学创作一定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反映现实和揭露现实，黄秋耘以散文家的感性思维取代了杂文家的逻辑思维，将自己的真情实感、生命体验融入到杂文的观点中，这是独具黄秋耘特色的。

黄秋耘也是一位评论家、批评家，他是有思想、有力量的战士，他以战士的姿态进行着文学批评，将战士的气魄和文人的品格融为一体。在他的文学评论中既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又有真实细腻情感的流露，他将散文家细腻的笔触与丰富的情感融入到文学评论、文学批评中，将理性与感性结合，产生了独有的文学魅力。因此我们说黄秋耘的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具有散文化的特点，不仅使读者易于阅读和接受，也包含了一种写作的智慧，为他的作品增加了艺术性。黄秋耘也承认自己的文学评论是有散文色彩的，他说：“我的文学评论文章还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散文色彩的。特别是人民常常把它们当做我的‘代表

^① 黄秋耘：《〈罗曼·罗兰文钞〉读后》，《黄秋耘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419页。

作’的那几篇，例如《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山乡巨变〉琐谈》《孙犁作品的艺术特色》《从微笑到沉思》《一部诗的小说》等等，与其算是正儿八经的评论文章，还不如算是‘议论性的散文’，或者‘散文式的评论’，总之，是间乎散文与评论之间的‘两栖类’文字。”^①这种散文化的特点令黄秋耘的评论文字极具感染力，易于展现自己真实的情感，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这表现出黄秋耘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现实生活所饱含的热情，他对生活是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和独特思考的，他说过：“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见解，独特的思想，或者不敢坚持自己的思想，就没有独立的风格，也就没有真正的艺术。”^②在黄秋耘的文论里处处展现着他的人生追求和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他用他的文字、他的观点、他的思想抒写了一代人的理想追求，他的文字也凸显出他的艺术观：“假如艺术不能把真理的火种传播于人间，假如艺术不能为人类的现在和未来而战斗，假如艺术不能拂拭去人们心灵上的锈迹和灰尘，假如艺术不能给予人民以支援和裨益，这样的艺术就毫无价值，也毫无意义。”^③黄秋耘认为文学艺术一定要传播真理，为人民服务，帮人民解决问题，给予人民支持，这是他文学创作的核心，他鼓励作家应该有勇气为民请命，透过作品去反映人民疾苦。尽管黄秋耘发表这类文章受到过严厉的批评，但都没有动摇他本身创作的信念，为民请命依然是他思想的主线，对遭遇到不幸的人会产生不自觉的同情。他始终敢于直面人生，不甘于灵魂的随波逐流，以火焰般燃烧的热情去创作，他的文章观点清晰，常引人思考，给人启发，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让人震撼，也彰显了其作品深刻的思想性。

① 黄秋耘：《我是“两栖类”》，《黄秋耘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② 黄秋耘：《“舍己从人”》，《黄秋耘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③ 黄秋耘：《启示》，《黄秋耘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三

黄秋耘文学创作的风格和他人生经历、所感受接触的文化是有关系的。黄秋耘1935年考进北平清华大学国文系，入学不久就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他在柯灵主编的《艺文线》上发表了《矿穴》，但不久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他被迫离开了清华大学，投笔从戎。军训后在抗战部队和军事机关服役，也接受党的任务到粤西电白县建立地下党组织，从事武装斗争。他经历过很残酷的生活，目睹了血腥惨烈的战争场面，但这并没有使他退缩而保护自己，反而更激发了他革命者的人道主义精神，他说：“经过十年动乱，无论是多么沉重的痛苦、忧患和灾难，甚至无缘无故的诽谤和中伤，我都可以忍受了，惟独对强者加诸弱者的欺凌，对人的尊严的轻蔑和恣意践踏……我还是不能忍受。”^①他时刻心系着人民群众，心系着国家，这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使其将满腔热血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文学创作道路上。作为革命者，他无法忘记自己革命者的身份和职责；作为知识分子，他又渴望用笔杆子唤醒人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让更多人关注到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

1943年，黄秋耘在香港协助张铁生编辑综合性刊物《青年知识》周刊，这是他投笔从戎到投枪执笔的开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黄秋耘又从事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抗战结束后，他在香港一间中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这期间，他出版了散文集《浮沉》，报告文学集《控诉》，还和朋友合作翻译了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搏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南方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工作。1954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大部分时间在《文艺学习》和《文艺报》工作，“文革”后他主要负责出版工作中辞典的修订。将近半个世纪以来，黄秋耘一直处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第一线，直到1954年调到《文艺学习》和《文艺报》编辑部后才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文学生涯。

黄秋耘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的文字真实而动人地呈现了历史的进程、时代的精神、生活的现状、作家的情绪。从小的家庭环境使他与生俱来就对贫苦

^① 黄秋耘：《这不算是件小事》，《黄秋耘文集》（第三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人民产生深切的同情心，成长的经历又使他目睹了很多遭遇不幸的人民的生活痛苦，令他从小就有了忧国忧民的意识。强烈的爱国情怀促使其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风雨飘摇的内地求学读书，考进清华大学与名师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俞平伯等名师接触后，更被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激励，他们身上深沉的悲悯感情深深地影响着黄秋耘。点点滴滴的经历使其坚定地选择了参加革命，渴望抗日救国，他始终与贫苦人民在一起。他在《犬儒的刺》中写道，文艺批评家“要有学问，要有修养，要有真知灼见，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更重要的，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要有直德直言的特操，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①。这说明了文艺批评家身上要具备政治责任感，要正视现实生活的困难，要始终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要敢于说真话。

黄秋耘天生对贫苦人民、对弱小者的关注和同情，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以此引导着人们去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而这使其作品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是心灵最本真的声音，极具他个人强烈的感情色彩，包含着浓烈的爱国情和人道主义精神。但是这并非说明他的文学批评就忽略了理性的参与，在一些评论文章里，他还是将感性批评和理性批评相结合，既有情感的真实顿悟，也有理性的分析思辨。他在《应当向托尔斯泰学习什么？》《为〈约翰·克利斯朵夫〉说几句公道话》中都有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具有很强的论辩色彩，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在《为〈约翰·克利斯朵夫〉说几句公道话》中他一方面肯定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格和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又分析强调如果其个人奋斗不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胜利还是无望的。感性的情感认知有了理性的分析渗入，使这篇评论既有理有据，又有深刻的思想性，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这绝不只是黄秋耘感性的直接流露，而是经过理性思考分析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他的理性思考依然是建立在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为民发声的基础上的，这又一次让我们看到黄秋耘对人生信仰的忠诚与坚定，彰显的也是他崇高的人格色彩。

综上所述，黄秋耘的文字具有批判精神、爱国精神，充满正义感，他敢

^① 黄秋耘：《犬儒的刺》，《黄秋耘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